

## 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sup>\*</sup>

马 戎

### (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

目前,世界各国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多少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学科设置思路的影响,往往以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为界限。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学术与知识是相互贯通的一个完整体系,通常只有因对这一体系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学派”,而没有把这一完整体系肢解后按具体研究领域形成的“学科”。自春秋战国以来,著名的大学者都开馆讲学,逐步形成以不同的“书院”为基地的不同“学派”。

由于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规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国古代的这一学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在西方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现在也在从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相互借鉴。比如,经济学家在借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社会学家在借用心理学的解释理论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调查方法,人口学家在学习统计学的分析技术,等等。许多近年来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多学科交叉协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社会学最早发源于欧洲,上个世纪初传入美国后,3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以派克教授为首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当时,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是与欧洲传统大城市很不相同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芝加哥市新型的地理格局以及大量移民和种族问题,使得有些问题无法用欧洲社会学的传统理论予以说明。“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就是努力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派克教授等人在芝加哥市的工人区、黑人区所开展的社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人类学研究异民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应用于美国都市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使得“芝加哥学派”走出一条与欧洲社会学传统不同的路子,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地位,并使美国社会学得到美国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中国社会学在其发展史上,也十分重视向其他学科的借鉴。早在上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先生等人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中国社会学把欧美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当时,吴文藻先生开始有意识地介绍欧美“功能学派”,先后请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派克教授(1932年)和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教授(1935年)来燕京大学讲学。

不同学科之间通过相互借鉴与结合,就可以参考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取长补短。比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几千人、几万人,有了这样

<sup>\*</sup> 以下10篇是2002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室和《民族研究》编辑部等部门联合举办的“田野调查”研讨会文章摘要。文章顺序按会议发言先后排列。会议报道详见本刊2002年第4期。

的调查规模和样本量,我们就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调查又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在时间与经费上存在限制,问卷内容有限,回答需符合一定的标准,编码比较死板等等,这就使得研究者无法了解被访者的许多具体细微的情况。而人类学、民族学的深入访谈以及民族志的系统调查,在这方面就显示出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虽然比较深入,可是调查的对象数量有限,所调查到的个案在整体社会中的代表性难以确定。如果能够把问卷调查和个案深入访谈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总之,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不应当是支离破碎的。假如有的人只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有的人只研究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的人只研究人们的政治活动,有的人只研究人们的社会交往,这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只能反映人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且不同的学科根据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资料有时还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由于人们在不同领域中表现出的行为是由同一个主体做出的,是相互影响的,密不可分的,所以只有对以上这些活动做出系统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这些活生生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偏重于研究各类活动的不同学科是需要相互结合和借鉴的,需要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知识,加强自己的能力。

## (二)社会学的问卷调查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社会学问卷调查方法的特点。作为社会学研究数据的来源,问卷调查是在大规模抽样调查中收集数据的最主要手段。问卷调查与其他资料收集方式相比,有以下几个长处:

其一,由于问卷是由调查者自行设计的,因此问题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问卷所要了解的许多情况在其他现有资料中无法得到,这就使得问卷调查具有特殊的优越性。

其二,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有关现实情况的资料在时间上是最新的。另外,由于问卷调查是由研究者自行组织实施的,研究者可以对问卷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抽查核实,所以问卷调查数据一般比政府统计部门(如城调队、农调队)的数据更为真实可靠。

其三,根据样本量和抽样方法,可判断出调查对象的代表性。通过代表性的确定,我们就可以把微观调查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使问卷调查的数据和研究结果可以用来对更大地域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填写问卷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 骨干调查人员直接入户,采用最可靠的“口问手写”的调查方法。第一,它保证了调查数据确实是研究人员入户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最高;第二,调查者可以亲自判断被访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否准确无误,如果有误,可以当场及时澄清,保证回答信息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及时发现问卷中的问题(次序、指标、度量、编码设计等),在调查过程中争取及时修改或采取弥补的措施;第四,在填写问卷的同时,调查者可以对一些有特点的住户记下问卷问题之外的其他有用资料和数据,这样就使得问卷调查与对住户的个案调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有助于对调查数据的解释。调查人员自己入户,还可以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经济活动、消费整体水平等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入户时可以直接观察到住户的住房条件、消费水平和消费特点(住房、饮食、衣着、摆设等)以及精神面貌,这些都可以生动地体现出住户的收入状况及其在社区中的相对社会地位。这些感性知识,对于研究者理解问卷中得到的数据很有帮助。

2. 培训所在单位的调查人员(如研究者所在大学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后由这些调查人员实施入户调查。这种方法的效果比第一种差一些,因为学生可能对课题的整体设计思路

并不完全了解,拾遗补缺的主动性稍差。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多少受过社会学的专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对问卷的理解一般不会有偏差。同时,作为与被调查对象无直接关系的外来调查者,他们一般都可以认真、忠实地记录、填写问卷中的问题。在骨干调查人员的组织和监督下,运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是很可靠的。

3. 在调查地点培训当地的调查人员。当地的调查人员一般包括当地政府的基层干部(如乡统计助理、会计等)和小学教师,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和认真程度普遍不如大学的学生。有些地方干部对于数据有“倾向性”;有时为了争取政府“救济”,愿意让群众把收入报得低些;有时为了表现地方政府的政绩,又愿意报得高一些。更有甚者,有时村干部坐在家,根据自己的印象把全村被访户的问卷都填写了,这样的数据基本上不可用。与当地行政机关多少“脱钩”的农村小学教师,有时相对客观和“超脱”一些。

4. 把问卷寄给(或转给)当地有关部门(如政研室、学校、统计局等),由当地有关部门组织问卷填写。这样的组织方式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实际调查中能否严格按照调查设计的程序办事,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是否理解问卷的内容,当地的组织者是否真正实施了户访调查,得到的问卷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地的真实情况,这些都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因此,这种方法也是最不可靠的方法。

如果样本规模很大,或因语言障碍(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不得不采用上述第3种或第4种方法,则可采取一些补救性措施。例如,在调查初期,由骨干研究人员到实地对已调查填写的问卷进行抽样核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这样将会对整个调查的质量有所帮助。通过这种补救措施,一则可以督促地方调查员更加认真一些,二则可以使研究人员自己对数据的误差和各项指标的可靠程度作出一个清醒的判断。

在开展问卷调查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需要,对一些有典型意义的被访户,穿插进行比较深入的人类学、民族学个案访谈调查。这样就可在了解当地被访者的“共性”或“共同的问题”的基础上,了解到某些被访者的“个性”或“特殊的问题”。有时,这类“特殊的问题”恰恰十分有助于揭示当地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未来发展趋势。户访过程中这种“额外”的访谈资料可以补充问卷数据的不足,也有助于研究者对问卷数据的实际社会意义做出说明。

入户调查者通过询问一些问卷之外的问题,还可以在分析时把某些特例(如极个别户主发生车祸导致完全丧失劳动力并不得不借债支付医药费,或者个别专业大户收入特别高)排除出去,以免在计算调查结果(如村民平均收入)时,使应当反映绝大多数住户实际情况的指标受到这些特例的影响。

### (三)问卷调查与社区调查在大型研究课题中的结合

在开展大型研究项目时,如果把大规模的抽样户访调查与比较深入的社区调查和个案调查相结合,就可以实现“面”与“点”的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以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这种在方法上跨学科的课题设计,可以强化研究的力度,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下面,就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和参与的两个研究课题为例,来说明我们在调查实践中是怎样把问卷调查和社区调查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

第一个课题是1987—1991年间进行的“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调查与研究共包括以下4个组成部分:

1. 宏观层面的研究,包括对社会、经济、人口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主要是应用人口学和社会学宏观分析的方法,对西藏自治区的各项统计数据及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初步归纳与整理,

从而对一些基本问题(族群人口分布、自然资源分布、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地区差别、城乡格局等)的概貌有一个整体性的印象。

2. 在此基础上,选择比较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来开展抽样户访调查(我们选择了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为此,进行了问卷设计,确定了具体抽样程序。我们根据调查前一年有关人均耕地、人均牲畜、人均收入等指标的统计数据,使用分层多级概率比例方法,从这三个地区的全部 437 个乡中抽取了 50 个乡,每乡抽取 2—4 个村,再采用等距抽样方法从当地乡政府的户籍登记簿中抽出各村的调查户。然后,在拉萨集中培训来自被抽各乡的藏族调查员,由这些调查员回到基层实施户访。这一阶段应用的是社会学的户访问卷调查方法。

3. 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农区和牧区的村落、较大的寺庙、工厂、城市街区和事业单位)进行社区调查。前一阶段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在这次社区调查中进行复查,这样既可以再次检验问卷调查所获数据的真实性,也可以获得问卷之外并有助于解释问卷数据的其他许多资料与信息,有助于把问卷内外各类资料信息相互连接起来,找出内在的联系,解释事物变迁的规律。

4. 针对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查。我们所做的专题调查涉及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寺庙问题、外来人口问题等等。这一阶段,我们根据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由于这些专题往往有较强的应用性,因此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欢迎,同时,这种设计也得到强调课题实际应用性的有关资助机构的欢迎。

第二个课题是“江苏小城镇研究”(与江苏省政研室、统计局合作),这一课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1. 先在江苏的几个乡村和小城镇展开社区调查,对几个村、镇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近期的变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提出研究专题与相应的衡量小城镇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费孝通教授以及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江苏省的研究者参加了调查方案和指标体系的讨论工作。

2. 1985 年在江苏省 7 个地区下属的 190 个小城镇开展了“区域性普查”,以行政镇为调查单位,要求每个镇根据本镇的实际填写由研究人员设计的 6 份问卷(涉及社会、劳动力、经济、服务业、个体企业、对外联系等方面),并对调查资料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

3. 在对“区域性普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专题撰写研究报告,从中分析与归纳出新的研究专题和思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研究人员和学生对具有典型性的镇开展社区调查。

4. 1995 年再次对 1985 年调查的 190 个小城镇进行“区域性普查”,根据当地发展形势的变化对原有的问卷内容进行了补充,这样,1995 年的调查结果就可以与 10 年前的结果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10 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影响变化的原因。

在以上这样的系列研究中,不同的研究方法交错使用,各种方法既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通过相互补充,使得强调不同侧面的信息和知识组合成一个更全面的知识系统,增加了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和对于社会变迁的解释力度。

(作者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871)

[责任编辑 李 彬]